

2030 上海发展研究丛书

上海城市空间转型

SHANGHAI CHENGSHI
KONGJIAN ZHUANXING

主编 王红霞

参编 薛艳杰 戴伟娟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丛书名：2030 上海发展研究

上海城市空间转型

主编：王红霞 参编：薛艳杰 戴伟娟

上海辞书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城市空间转型的内涵及理论·····	001
第一节 城市空间转型的内涵·····	001
第二节 国内外城市空间转型的理论综述·····	007
第三节 城市空间转型的发展趋势与动态·····	014
第二章 国际大都市空间转型发展的经验、规律与趋势 ·····	018
第一节 纽约的城市空间转型·····	018
第二节 巴黎的城市空间转型·····	028
第三节 伦敦的城市空间转型·····	036
第四节 东京的城市空间转型·····	049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空间转型发展历史沿革·····	055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阶段·····	055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特点·····	062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077
第四章 上海城市空间转型发展的现状、问题与趋势 ·····	080
第一节 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现状特征·····	080
第二节 上海城市空间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093
第三节 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趋势·····	102
第五章 2030 年上海城市空间转型发展的目标、思路与路径 ···	109
第一节 未来上海城市空间形态的客观要求·····	109
第二节 2030 年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目标与原则 ·····	111
第三节 2030 年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与总体布局 ·····	114
第六章 2030 年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主要任务 ·····	118
第一节 2030 年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总体任务 ·····	119



第二节	2030 年上海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的主要任务	126
第三节	2030 年上海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主要任务	131
第四节	2030 年上海交通空间布局优化的主要任务	136
第五节	2030 年上海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的主要任务	144
第七章	上海城市空间转型的政策建议	157
第一节	上海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157
第二节	上海人口空间转型的政策建议	160
第三节	上海产业空间转型的政策建议	165
第四节	上海交通空间转型的政策建议	168
第五节	上海生态空间转型的政策建议	171
参考文献		179

第一章

城市空间转型的内涵及理论

城市空间转型是一个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空间体现。世界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和经验表明：随着城市的能级提升和转型发展，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世界城市的形成需要有支撑世界城市功能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

第一节 城市空间转型的内涵

我们通常讲的城市空间其实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泛指城市的物理形态和空间结构，是城市在四维空间上的映射。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认为：城市形态反映了人类居住活动的形成和转变过程，城市的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及其特征是城市形态的核心内容。

一、城市空间转型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城市空间最早是城市建筑和规划关注的领域。从城市建筑和规划学来看，城市空间呈现了轴线形、放射状、扇形、星形、带状、卫星状等多种城市形态；后来逐渐拓展延伸到城市地理、社会学和城市经济的研究领域。国外的城市空间概念不仅包括城市的物质空间，也包括空间深度反映的社会空间。总之，城市空间是指城市各物质要素的空间区位分布特征及其组合规律，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交织作用的物化形式和空间

体现。近些年来,城市研究发现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仅城市的历史地图有所不同,而且城市各种空间要素的布局和功能布局也在发生改变。这种与城市转型发展相伴而生的城市空间变化就是城市空间转型。

从城市空间的概念来看,城市空间转型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包括城市物质要素如人口、产业、资本等要素空间布局的变化以及作为功能综合体现的市镇体系的变化。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随着战后城市的繁荣和大都市的兴起,许多城市不再呈现单一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而是逐渐出现多中心或多核城市。城市发展带来的城市蔓延、交通拥挤等城市问题使城市空间研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社会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经历了城市发展转型后,现代城市空间表现为三个基本特征:(1)由多元化城市核心构成的复杂的内部结构;(2)扩张中的郊区;(3)广泛的腹地系统(Scott and Storper, 2003)^①。随着城市功能系统的不断升级,城市的内部功能联系投影于空间,使城市区域逐步从“单中心”的空间结构向“多中心圈层式”的空间结构形态演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世界城市表现出了“多中心圈层式”的空间结构:其核心是作为世界城市体系主要节点的中央商务区,渐次向外是新的商业中心区、内部边缘城市、外部边缘城市、边缘城镇复合体以及最外围遵循劳动地域分工的专业化次等级中心,它们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分工,圈层结构与圈层功能的专业化同步形成(Hall, 2001)。

^① Scott, J. and Storper M. Region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M]. Regional Studies, vol.37: 6 & 7, 2003. 579—593.

二、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类型与空间发展模式

(一)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1. 经典的三种城市地域结构模式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模式有许多研究和划分,但是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是几乎所有涉及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都要提到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伯吉斯根据 20 世纪 20 年代的芝加哥,引入植物生态学的概念,在假设地理均质性、人口均匀分布以及地价向外递减等前提下,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模式:即由圆心向外依次布局中央商务区(CBD)、过渡地带、工人居住区、中产阶级居住区、富人住宅区以及通勤带(Burgess's Concentric Model)。这被认为是最早揭示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尝试。之后,霍伊特(Hoyt)基于美国 142 个城市的研究在 1939 年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扇形分布理论(Hoyt's Sector Model)。霍伊特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受到了运输的重要影响,城市空间要素沿主要交通干道而呈向外放射状的扇形分布。1945 年,哈里斯以及乌尔曼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多核心模式(Harris and Ullman's Multi-nuclei Model),他们发现:城市的土地利用不是只围绕一个中心发展的,城市有多个分别独立的核心,城市空间要素是围绕这几个分别独立的核心分布和活动的。

2. 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以城市经济学派的单中心城市结构理论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中心结构理论为突出代表。1964 年,阿朗索(Alonso)在杜能等单中心城市假定的基础上建立了地租-城市空间结构的模型。1969 年,雅各布斯(Jacob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主要解释当时引人注目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空间结构逐步由单一中心向多中

心转变,因而建立在单一中心城市假设基础上的上述理论缺乏良好的现实解释力。1996年克鲁格曼(Krugman)在“杜能环”、“中央区理论”和夏林(Schelling)的“分割模型(Segregation Model)”的基础上,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结构的自组织模型”,并指出:一个城市结构的形成是该城市中厂商之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自组织结果(Krugman, 1996: The Self-Organizing Economy)。藤田(Fujita)和克鲁格曼在2000年提出了一个空间经济的正式模型(A Formal Model of a Spatial Economy)。该模型指出:一般来说,随着城市地区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产业层次水平的提高,城市的空间结构将不断从单一中心结构向两中心结构等进行演变,等等。

3. 基于城市化和城市规划学派郊区化空间发展模式

从欧洲城市和美国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城市的空间发展有三次明显的变化。第一次是人口居住的郊区化,欧洲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发生较早,在美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随着战后城市的繁荣而出现人口居住郊区化。第二次是70年代以后以超级市场为代表的商业郊区化;第三次则是就业岗位的全面郊区化。在这个过程中,卫星城(Satellite City)、新城(New Town/New City)和边缘城市(Edge City),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卫星城、新城的概念来源于19世纪规划鼻祖霍华德(Eben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20世纪20年代恩温(Unwin)认为应在城市规划中通过建立一系列卫星城来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和就业拥挤。后来,随着卫星城建设中暴露出对中心城带来的额外通勤压力等问题,人们提出了应把卫星城建设成为功能相对独立的新城,并在美法等西方国家得到推广。边缘城市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加罗(Garreau)于1991年在他的《边缘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约有一半的美国人居

住在城市郊区。郊区成为城市的新兴中心。这些新的中心具备了典型的城市功能：居住、就业、交通及游憩等，但建筑的密度比中心城市低。加罗认为，边缘城市是美国城市发展的新形式，是位于原中心城市周围郊区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就业与居住中心，而这些中心在 30 年前还是农田、村庄或纯粹的居住用地。

（二）城市空间的区域扩展

1. 增长极带动的城市空间拓展

这一模式以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为典型代表。佩鲁把产业部门集中而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称为增长极。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增长极一般是区域内各种条件优越，具有区位优势少数地点。一个增长极形成之后，它就会吸纳周围的生产要素，对周边地区产生吸引力，带动周边地区向增长极靠近的极化发展。当这种极化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增长极已扩张到足够强大时，集聚作用会逐渐演变为扩散作用，生产要素扩散到周围的区域，从而带动周围区域的增长。佩鲁的增长极本是指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增长空间，能够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Boudeville)、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sh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该理论被引进经济地理，成为指导城市地理空间扩张的理论之一。

2. 点—轴空间扩张模式

点—轴空间扩展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点轴开发理论。该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也就是指“点”与“轴”相结合形成的发展模式，是增长极理论的发展。波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展的国家级规划中，曾把点—轴开发模式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可以说，据“点”开发理论是地域极化理论的一种。根据该理

论认为,由于资金的有限,要开发和建设一个地区,不能全面铺开,而要集中建设一个或几个重要的空间点,再通过这些重要空间“点”的开发和建设来影响与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点开发理论在现实中有许多成功应用的案例,如日本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实施策略,就是“点”开发策略。轴线开发或者称带状开发是点开发理论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根据轴开发理论,区域的发展一般有一个发展上的空间轴线(常常是城市或区域的基础设施)。联系城市与区域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水、各种管道等主要工程性基础设施常常是城市或区域的发展轴,我们发现,许多工厂、居住地等重要集聚点一般沿着这些轴线布局。由于发展轴的客观存在,点轴扩张也成为许多城市空间扩张的模式之一(陆大道,2003)。

3. 大都市区和全球化城镇网络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也有向区域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形式。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Gottmann)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戈特曼(1957)在《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大都市带”(国内又翻译为“城市群”)的概念。金斯伯格(Ginsburg)(1988)通过比较日本的大都市带与美国东北海岸大都市带之后,指出主导产业扩散是日本大都市带发展的动力,而居住地扩散是美国的都市带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分散大都市带”(Dispersed Megalopolis)的概念,强调由许多专门化职能的城市中心组成的多核心系统。

日本学者十分注重大都市的圈层结构动态变化,认为大都市在空间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圈层特征,并提出了狭义大都市圈(即都市生活圈)和广义大都市圈(即大都市势力圈)的概念。

杜西亚迪斯(Doxiadis)进一步提出了世界连绵城市(ecumenopolis)结构理论,认为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大都市带最终都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型的环绕全球的城市空间系统。

4. “走廊型”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and 巨型城市区

惠贝尔(Whebell)在1969年提出了“走廊理论”(Theory of Corridors),指出在一些地区存在着城市走廊;布赖恩特(Bryant)(1982)提出了“城市乡村”(City Countryside)理论;布鲁恩(Brunn)和威廉斯(Williams)(1983)提出了“城市系统”(System of Cities)理论;加拿大学者麦吉(T.G.Mcgee)在1991年提出用Desakota(desa即乡村、kota即城市)来表示热带地区的人口密集地区。麦吉在对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出现的与西方大都市带类似而发展前景又完全不同的新型空间区域研究时提出了Desakota的概念,来表示“人口密集、位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区”。后来这一概念发展成为类似大都市带的超级都市区(Mega Urban Region, MR)概念,也有称之为巨型城市区。

第二节 国内外城市空间转型的理论综述

一、城市空间研究的几个阶段

从国外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来看,城市空间理论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下半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早期城市空间研究阶段,提出建立了“城市区域”的概念,对城市空间形态、城镇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开拓性分析;这个期间的研究以德国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为主流,如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理论等。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以“大都市带”为代表的理论从早期空间分布的静态研究转向空间演化的动态研究,城市空间研究尺度

扩大,其中,以佩鲁(1950)的“增长极”理论为代表的空间极化发展模型引发了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城市空间开始从只重视物质空间规划转向综合的社会发展规划。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新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兴起,城市日趋复杂的空间形态、空间组织及其重要影响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开始着重于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变。

二、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1. 地租的影响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

源于农业区位研究的冯杜能(Von Thunen)的农业圈层论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冯杜能圈层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派解释了土地空间利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之后,在德国地理学家和区位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支持下,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理论得到充分发扬。20世纪30年代的“中心地理论”成为后来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讨论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时引用的经典文献。20世纪70年代左右阿隆索(1964)、穆特(Muth, 1969)和米尔斯(Mills, 1972)等人建立了众所周知的“标准城市模型”(Standard Urban Model),根据该模型,理性消费者的理性(土地)租金支付行为将使城市人口分布遵循向下倾斜的人口密度曲线,由此决定了城市将具有单一中心的空间结构。汉森等(Hansen, 1959; Alcay, 1967)还发展了引力模型,用来解释物理空间上的集中现象。

2. 社会和城市文化等因素也影响和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

城市的空间结构不仅是土地利用直接作用的空间体现,而且还与人们的行为相关。富勒(Foley, 1964)用行为研究方法发现城市空间开发的模式其实与决策者的个人行为有关。富勒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包括三种要素: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

20 世纪 70 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在研究芝加哥的城市社会问题时发现:社会阶层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构成。

Follain and Malpezzi 在 1981 年则提出了与标准城市模型完全相反的“衰败一起飞”城市模型(Blight Flight Model)。该模型认为,由于存在着高税收、低生活质量等问题,人们为了追求生活愉悦而选择离开中心城区,在许多城市边缘或郊区集聚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从而使城市的空间结构呈多中心分布。

3. 土地利用和街区、市镇的规划影响了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

城市建筑学和规划学派认为:建筑和规划从形态上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是注重空间形态单元及空间形态成因的英国康泽恩(Conzen)^①和意大利建筑设计师卡尼吉亚(Gianfranco Caniggia)^②。康泽恩和卡尼吉亚的城市空间思想对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城市地理学的代表流派。其中,康泽恩提出的“市镇规划”的思想至今仍在应用。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新城建设和规划对这些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4. 道路(Paths)、边界(Edges)、区域(Districts)、节点(Nodes)和标志(Landmarks)决定了城市的形态特征

美国城市规划师林奇(K.Lynch, 1960)在对波士顿、新泽西和洛杉矶三个城市抽样访谈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通过道路、边界、标

① Conzen, M.R.G. Alnwick, Northumberland: 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 [M]. G.Philip, 1960.

② Caniggia, Gianfranco, and G.L.Maffei.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and building typology: interpreting basic building [M]. Firenze: Alinea, 2001.

志、节点和区域五种形象要素来识别一个城市。林奇认为：上述五种要素给城市带来了自己的形态特征。随着城市形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交通基础设施在城市形态的演进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而在现代城市形态的演变中，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成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城市外围区域，其空间形态更加受到城际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Levy, 1999)。

三、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不同动力机制

1. 转型推动的城市空间重构

转型时期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有诸多影响因素，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迁居、土地优化配置和土地利用结构、政治行为、经济体制改革、转型时期社会变化，以及城市主体——居民的观念和行为要素等宏观和微观要素都是影响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推动因素(冯健、周一星, 2003; 2004; 刘彦随, 1999; 冯健、刘玉, 2007)，其中，经济活动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最大，其作用机制也最为复杂。在经济层面上，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机制是这样运行的：首先，地方和外来资金投入是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经济保证，在投资推动下，旧城改造得以进行，旧城改造本身导致了城市景观重塑和城市空间改造，同时它又与工业郊区化、交通设施建设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而郊区化带来的郊区住宅建设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另一方面与城郊购物中心及大型超市发展形成互动。上述诸方面直接地改造着城市空间，并在地方与外来资金的保证下参与城市规划与调控。从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促使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发展，进而推动了城市工业郊区化。这样，旧城改造、郊区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的保障下，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

2. 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城市空间重构

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对城市空间机构的影响,目前应用较多的是新古典主义城市经济学的思想。新古典主义城市经济学受德国古典经济区位论的启发,吸收了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思想,其中 20 世纪 60 年代阿朗索竞标租金(bid-rent)模型的分析方法影响较为深远,该方法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入手,以地租、利润、成本和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企业、居民和公共设施的位置分配。但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往往采用过于理想与抽象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解释城市空间复杂变化的能力不足。行为主义学派对此进行了修正,他们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规范分析基础上加进实证分析,引入可达性(accessibility)、技术和知识等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产业分布的空间模式及其变化。

我国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城市化速度加快和城市功能提升使得城市政治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我国城市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较为滞后,城市空间方面的研究散见于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中。

郭鸿懋(2002)通过重点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的机理,指出市场原则决定了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高利润率产业占据城市中心位置。江曼琦(2001)的研究则认为,城市经济活动最终要落实到空间上,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必然影响到城市空间布局。

3. 社会转型导致的城市空间重构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生产方式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转向和“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时代的来临,城市作为社会经济转型突出的地域,不断加剧的社会空间分

异构成了西方城市社会地理框架的主要特征,城市变得“分化”、“碎片化”和:“双城”化,新的空间类型不断出现(李志刚、吴缚龙,2006;黄晓军等,2009)。城市社会学中著名的芝加哥学派非常注重城市空间重构而导致的功能变化,其早期的同心圆理论(Burgess, 1923)、扇形理论(Hoyt, 1939)和多核心理论(Harris and Ullman, 1945)至今仍是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基本分析工具。芝加哥学派将城市当作生态社区,强调经济自由竞争对城市空间的作用,认为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机构控制着市中心的土地,占据城市空间位置的是社会的强势集团,如政府与高收入群体。

我国城市正处于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同时也处在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空间矛盾凸显;而对于大都市来说,除了地域空间重构外,还存在着日益加剧的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社会极化、居住隔离、公共空间漠视、弱势群体边缘化、新城市贫困、单位社区杂化等空间重构特征不断显现,单体均质而整体异质的社区空间成为中国城市的典型特征(李志刚等,2004;柴彦威等,2007)。

城市居民迁移依据收入水平选择城市空间具体位置,中产阶级和较高收入社会群体居住于城市中心从而带来城市居住空间的核心富裕化,而中低收入群体则不断向城市郊区迁移。相应的情况还出现在城市的产业空间竞争上。城市产业布局调整、城市居民在市内的空间迁移与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得城市空间大幅度扩张。居住在中心城区之外的居民与企业会尽可能贴近中心城区居住或生产。在城市交通主要干道之间,居民与工业企业填满了所有剩余空间。在郊区化与城市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城市空间扩张过快,甚至有蔓延的趋势。如果缺乏相关制度的约束,过快的城市郊区化必然使城市空间扩张失序,而出现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对外向周围作“摊大饼”式的盲目扩展。

这已经是国内许多城市经历过的城市蔓延弊病。

4. 基于“中心—外围”反作用改善城市空间结构和促进城市空间转型

从发达城市 20 世纪以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来看,伴随着城镇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作为城镇体系发展“源”的中心城,其规模都明显呈下降趋势。在致力于缓解“大城市病”的长期努力中,中心城和新城的空间结构比重一直是城市空间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欧美发达城市或通过内外城之间的通道条件(交通设施)建设和改善来缓解中心城的拥挤;或通过建设和改善新城和卫星城的居住、就业和生活条件来改善城市空间布局;或通过城镇之间产业的转移和联系(产业与功能的新分工)带来了城镇的空间融合或分散;等等。这些不同的发展方式和推进手段,带来和形成了今天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布局。我们通过考察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世界发达城市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历程发现,有些城市如纽约在中心城的规模缩小的同时,内城和外城同步扩张;而有些城市如东京则明显地是以市部的扩张来缓解向中心城的过度集中——如东京的卫星城到新城的建设在 2000 年时取得了明显成绩,城市空间结构的极化现象得到明显改观。假设在城镇体系形成的最初时期只有一个城市,那么,借鉴克鲁格曼(1999)新经济地理中对空间层次的“中心—外围”概念,我们可以把城市的空间层次划分为核心层、边缘层和外围层,上述不同的推进路径实际上是分别从边缘和外围入手,或者以两者“双管齐下”来带动城镇体系的形成和结构改善(图 1.1)。仅仅从核心外围之间的层次关系来看,以上两种路径实际上都是通过外围发展来改变核心层结构进而改善整个空间结构的(王红霞, 2009)。